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

——政治领域的全球化



[德] 乌尔利希·贝克 等著
张世鹏 等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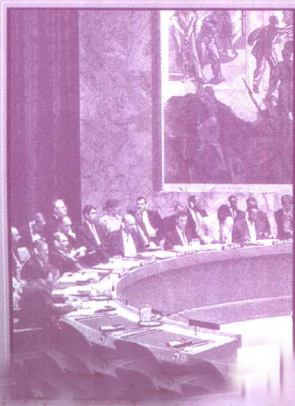
北 京 大 学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丛 书

D81
18

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

——政治领域的全球化

[德] 乌尔利希·贝克 等著
张世鹏 等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张世鹏等
编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1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 - 5078 - 2305 - 9

I. 全... II. 张...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②国际
化—研究 IV. ①D5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9282 号

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

编 译	张世鹏
责任编辑	何 清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53304(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53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4年1月 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78 - 2305 - 9 / D · 90
定 价	19.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面意见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坚持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特色。

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离不开共性，但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这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常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应强调国家特色。何谓特色？它指的是独特、特质、开拓创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就是突出鲜明个性，从各自角度，观察国际社会，依据与时俱进，探讨客观发展规律，说明新问题，提出新思维，得出新结论。特色是学科的灵魂。缺少灵魂的学科，毫无用处。特色总是同整体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显现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不是脱离整体和普遍性而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要求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它拒绝的是教条式地全盘照搬，也反对否定一切，要求在继承和比较中创新。

国际问题作为学科研究，英、美、法三国最早，距今 83 年。特别

是美国的学科建设最为兴旺发达,仅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三次大的论战和无数次小的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流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在探索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新建树,但都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现了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特色,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国情、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原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地球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国常强调上帝赋予的“使命感”,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美国的各学派和学者深受熏染,无不打上深深烙印,呈现鲜明的美国特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最早在中国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始正规地、系统地培养专业人才。应该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晚于美国。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国情和文化传统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张的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派和学者,应该自立于世界国际问题研究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应有自己观察世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弄清“权利政治”核心,从新的视角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但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始



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强权，维护人权、主权与球权，充实完善人权、主权与球权，使三权相辅相成，实现完整的统一。

权利，主要表现为人权、主权、球权，均属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主权是国家的正当权利，球权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

从历史渊源看，人权思想问世在先，主权法定最早，球权也因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而随后登上国际舞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法定了主权又宣布了球权的诞生。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正式法定了人权与主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各国的人权与主权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国内法扩大为国际法，国际社会的球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涉及领域由少到多，不断拓宽扩展，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清算战争罪行的大前提下，妥协、协调，既维护主权又对等转让主权的結果。一部国际关系史，既是战争与和平史、大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关系史，也可以说是球权演变史。

球权管理的是国际事务，主权管理的是国家事务，虽然球权没有主权的权威性大，但当今世界球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且越来越大，它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

迄今为止，在球权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获取更多利益，各国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从没有真正平等过。

但应当承认，球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提供了维护主权，实现发展的强有力保证。虽然球权的局限性大，主要以实力为

依据。但在公认的游戏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国际行为规范在所有国家都适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主权国家应当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行使球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利,但要加强团结,努力发展自己,既遵循球权,按球权办事,又要改革球权,使其不断充实完善,用球权维护主权和人权。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既百花齐放,又日益走向统一。但不是统一于世界政府和霸权领导,而是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主权和人权的同时,必须承认球权,把它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使主权既同人权,又同球权科学地统一起来。主权、人权、球权是紧密相联而活动于国际舞台的,既不能轻视其某一权,又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三权的相互关系是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是重视球权的时候了。任何损害球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三权科学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研究国际问题。权利政治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完全不同,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第三、抓住首要问题,科学界定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三定”:定位、定向、定标。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颇有见地。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问题学,或国际问题研究,就是“己学”与“彼学”的结合,更需要知己知彼。国际问题研究中为什么要知己知彼?简单地讲,就是给国家定位。因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谁是敌国,谁是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同谁对抗,同谁合作?必须进行科学的定位,并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当前,必须正确判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危险,研究主要打击目标。同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冷战后的霸权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同社会制度相联,作为世界敌国对待,而是属于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有霸反霸,不涉及其他,这是正确的做法。“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上升为世界公害。它与世界各国为敌,肆无忌惮地残害人类,既践踏人权,又危害主权,也无视球权,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必须有恐反恐,有霸反霸。

历史是一面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全球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最终联成一体,全球范围的国际问题开始出现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国际社会舞台。迄今为止,国际问题的发展演变,均以世界经济政治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权益运转,主要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1)殖民主义体系形成与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2)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3)法西斯主义猖獗与反法西斯斗争时期;(4)两霸争夺与反霸权主义斗争时期;(5)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存与反恐反霸时期。从国际问题发展演变的五个时期中,我们发现三个规律性的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际问题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始终不变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国际问题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转,表现为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规律性现象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向”: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新时期影响全局的主要危险。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

家间长期共存，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讲话在理”，说话办事要有准绳。当今世界，观察国际形势，判断国际是非，需要新的“定标”。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名正言顺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际事务只能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不能屈从于霸权，而应遵循球权，因为球权是以主权和人权为基础的，最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世界上事情，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关键之处在于球权同人权、主权的统一。

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标”，从来就是“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破旧思想、旧认识、旧判断，破落后于实际或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认识和判断，又立与实际一致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与时俱进”需要转换脑筋。

现在是转换脑筋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2年6月22日
于北大兰旗营小区



序 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内开始全球化研究以来,我和中央编译局的殷叙彝先生,以及其他同事合作翻译出版了《全球化陷阱》、《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世界》、《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全球化与政治》等书籍。我们翻译出版国外的全球化学术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向国内读者介绍国外全球化研究的思想动态和理论状况,力图推进国内的全球化研究。秉承这一宗旨,我在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后,继续组织翻译了这本《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作为黄宗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间成果,奉献给国内广大读者。

2000 年上海的一家报纸曾经谈到,目前国内开展的全球化研究是历年以来在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做得最好的。深入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准确把握和判断各种不同学术流派的不同观点,这是实现“国际学术接轨”的前提条件。现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世界的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政治上的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无论是政界、经济界、学术界、还是大众媒体公共舆论界,也无论哪一个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甚至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化辩论,并且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对于自身的学科建设开拓出许多

新的科研领域,甚至对于整个学科体系进行变革和改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并且积极推动了一场正在实现“全球化的全球化辩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辩论发展到今天,似乎真的走到了“全球化的极限”。最近读到中央编译局杨雪东博士主持翻译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的学术著作《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据说,这本书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五星级著作”,并列入英美许多大学相关课程重要的参考书目。可以说,这本书把全球化研究推向了极致。它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它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的世界交往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今天的全球化。在这里,全球化绝非仅仅限于一种经济现象,它涉及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居民人口迁移的全球化、社会文化的全球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似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神奇大口袋,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全球化似乎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秘幽灵,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摆脱全球化。几年来,人们心惊胆战地谈论金融投机与金融风险的全球化,谈论核武器威胁、非法销售武器和暴力冲突的全球化,谈论水资源减少、物种灭绝、气候变暖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的全球化,谈论失业、贫困、文盲与各种社会排挤的全球化,谈论各种黑社会组织以及贩毒、贩卖人口、卖淫等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全球化,谈论各种病菌、病毒传染的全球化。最近德国一家杂志(《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2001年4月)谈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化,提醒人们注意国际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如何帮助西方法西斯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无怪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研究命题。

“因为问题正在全球化,而政治也必须全球化。因为一种逐条逐项的、反应性的危机治理已经很不够了,所以必须建立新的秩序结构。如果要想使21世纪的世界能够得到治理,就要使用不同



于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纪的另一种方式进行治理。”——这是德国杜伊斯堡—格哈德·墨卡托大学教授弗兰茨·努舍勒先生在本书收录的《全球治理、发展与和平，全球秩序结构的相互依存》中所说的话，也可以算作是对于本书标题《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所做的注解。从思维逻辑的角度来说，他的话是完全没错的。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政治全球化的行为活动主体也是多元的。绝对不能仅仅理解为某一件事情，例如绝对不能把政治全球化仅仅归结为美国霸权，即整个世界的美国化。或者在世界范围内对于美国模式的模仿和依赖。政治全球化肯定包括美国权势集团、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大力推行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但是，它肯定不仅仅局限于这方面的内容。政治全球化所涵盖的内容肯定是无比宽泛和无比广大的，至少还应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应对战略。

在这里，我想借用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对全球政治所下的定义：“全球政治作为一个术语，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在世界某个角落所做的政治决定和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传遍世界，并获得世界性的反响。此外，各个政治活动中心或政策制定中心可以通过快捷的信息传播途径连接成复杂的决策和政治互动网络。与这种扩展相连的是全球政治活动产生的、通常是更向纵深发展的影响。作为一种结果，全球层次的各种发展几乎在同时就能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反过来亦是如此。”^①

^① 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69页。

研究政治全球化不能不提到美国霸权。加拿大左派学者、《社会主义文摘》杂志主编奇利奥·帕尼在《全球化与国家》一文中提出了“国家国际化的概念”，他反对眼下流行的经济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主权的看法，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国家政府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国际化。他引用罗伯特·考科斯 1992 年在《社会主义文摘》杂志上的一段话说：“没有一种明确的政治的或权威的结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可以用一个法文词‘星云状态’，或用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概念来描述。”“在全球共识的官方看守人中间，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跨国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并已取得了共识，以及受到全球化意识形态支持的指导性原则，这些原则传到了各国政府和大公司的决策渠道……这种集中化的政策影响对各国政府的决策性冲击可以叫做国家的国际化。它的共同特征是把国家变成一个从全球经济到民族经济的传送带。而在这以前，国家起的是保护国内福利不受外部干扰的屏障作用。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集中在那些与全球经济最密切的机构——总统和总理的办事机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那些与国内经济有较多联系的机构——产业部、劳工部等等——变成了从属机构。”^①

奇利奥·帕尼在文章中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加拿大为例，具体叙述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在这种“国家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充当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的传送带。他反复强调，1945 年以后，“经济生产权力的力量对比决定性地转向美国，美国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世界占据了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在布雷顿炮制出来的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框架内——在对这些不断监控的情况下，倡议并批准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依附美国政策的一种表现——通过对各种不同国际形式的组合，站稳了脚跟”。他指

^① 罗伯特·考科斯：《生产、权力和秩序》，纽约，1997 年英文版，第 132 ~ 133 页。



出，“美国财政部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将它自己的政策标准国际化，并在世界经济中渗透。”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一种重新限定国家作用的新的理论是由各种非官方组织——三边委员会、比尔堡会议、罗马俱乐部和其他有声望的论坛——在对意识形态进行修改时共同提出来的，并在以后得到了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类国家官方机构的认可。”考科斯把这种理论归结为“撒切尔—里根超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的支配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全面渗透，这是我们近年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国外的全球化研究中，有人把全球化定义为世界的美国化，也有人说成是世界的欧洲化。这两种说法的共同含义就是指起源于欧洲的、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和推广，或者说，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化。这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各自强调自身特殊的发展模式。

因为长期从事西欧研究，我对于在全球化国际讨论中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声音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我在2000年曾经翻译出版了里斯本小组集体撰写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这个小组的成员基本上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本书中一方面批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战略，批评美国霸权，另一方面原则上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全球化方针。去年，中央编译局的柴方国先生翻译出版了原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斯卡·拉封丹的《不要害怕全球化》，这本书基本可以代表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立场。

国际上流行的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政府对于本国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从而挖掉了凯恩斯主义宏



观经济调控手段和社会福利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行动能力，从而使战后在西欧社会中一度曾经非常成功的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模式陷入危机。本书收录杰弗里·加勒特的文章《全球化与政党》则集中反驳了这种看法，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生命力进行辩护，作者的结论是“左翼政治权力与减少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全球化削弱，更确切地说，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反而加强了。”

弗兰茨·努舍勒的文章《全球治理、发展与和平，全球秩序结构的相互依存》集中论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全球化战略。他把这个战略的起源追溯到20年以前发表的《勃兰特报告》。他引述维利·勃兰特的话说：“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我们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涉及整个人类，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必须国际化。各种危险和挑战——战争、动乱、自我摧毁——都在全球化，这就要求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它要超越宗教的视野，而且远远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努舍勒进一步解释说：“人们把对于全球化挑战寻求答案的尝试称为一种全球政治或者世界内部政治、另一种世界秩序政治或者全球结构政治，同时更多地成为全球治理。在维利·勃兰特推动建立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后，这个概念被引入国际辩论。但是，人们把这个概念与各种不同的设想结合在一起。”确实，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也就是说，在由谁治理、如何治理的问题上，答案是多元的。努舍勒在文章中对于美国的政治霸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21世纪初，全球治理事实上是一个十分脆弱的方案。克林顿政府转向一种单边主义的霸权政治，企图破坏多边主义的协调合作方案。”但是，实际上“仅仅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自己，或者在北约联盟内都无法解决世界的治理问题。在一个多中心的喧嚣世界里，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没有前途的。”努舍勒对于北约投入科索沃战争也提出了批评：“北约自我授权进行反对南



斯拉夫的空中战争,不仅——损害了联合国宪章——向使用暴力的垄断授权提出了挑战,而且加强了人们对于为了阻止严重损害人权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怀疑。”努舍勒提出:“为了不使全球治理理论沦为空想,要求建立一系列管理机构,深入规范国际合作的各政治领域;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制裁世界范围的反人道罪行;为了改善人权状况、发展法制国家,通过发展政策中的相应的协调与资助手段实行一种干预政策组成一个国际市民社会,使政治不再单纯成为政府的事情;尝试召开世界代表联席会议,协调合作处理最紧迫的世界问题。”^①

我们知道,在努舍勒提出他的全球治理设想以前,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曾提出一个全球治理方案,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这本书中也曾积极宣传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调控体系”。这些都属于对于未来世界的设想。也许是欧洲联盟的建立提供了民族国家区域联合的成功经验,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联合抱有特殊的兴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汉斯·约亨·福格尔最近在一篇文章(《千禧年的思考》)中说:“我认为下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有操作可能性的世界机构,永远摒弃作为解决争端手段的战争。”奥特弗里德·赫弗进一步提出了“辅助性的和联邦式的世界共和国的公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德特勒夫·阿尔贝斯与赫尔曼·施温格联名发表文章《欧洲的全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明确提出“欧洲全球化”的口号,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欧洲文明。他们说:“欧洲文明的全球性美好时光还没有过去。因此很重要,不应仅仅把欧盟理解成真正的目标,即辅助性的和联邦式的世界共和国实现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应当强调它在规范上的独特性。欧洲的社会民

^① 弗兰茨·努舍勒:《全球治理、发展与和平,相互依存的全球秩序结构》,收入弗兰茨·努舍勒主编:《21世纪的发展与和平》,狄茨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504页。

主和经济民主不仅走在世界共和国的前面,而且提高了我们可以据以设想这种世界共和国的性质和尺度。”^①阿尔贝斯和施温格的文章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在2000年9月29日召开的柏林会议讨论基础上写作的。这个党正在筹备修改基本原则纲领,估计“欧洲全球化”的思想将会写入未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无论是从社会民主党研究还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都值得高度重视。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近年来主编出版了许多研究全球化的学术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本书收录了他的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民主的两难处境》。贝克显然属于西欧知识分子左翼,他把欧美政治精英们近年宣传的“全球邻里关系”、“全球责任”破译为“用另一种手段继续推行西方帝国主义政策”。

贝克说:“在冷战终结、欧洲军事对峙结束以后,德国国防部长福尔科尔·吕厄说,德国被朋友们所包围。这种被包围的感受使得在威胁消失以后出现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整个西方、它的各种政府机构与政治家们陷于恐惧,直到今天,他们还心惊胆战。毫无疑问,这种突然变成没有敌人的西方民主成为与此同时在民族国家机构和跨国机构框架内,如欧洲、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与联合国等,进行国内与国际调整的主要原因。它需要新的、使自己更新的合法性泉源。这种合法性必须使他们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为自己的行动,以及所获成就的自我描述进行辩护。”“对此十分谨慎的表述是:西方为了支持人权,已经把国际政治的道德化写上自己的旗帜,这种国际政治的道德化十分完美地填补了这个真空,在这个真空内,它为各种机构创造了一种世界

^① 德特勒夫·阿尔贝斯、赫尔曼·施温格:《欧洲的全球化和社会民主主义》,引自殷叙彝先生翻译手稿,第6页。